

一带一路视域下泰国职业教育发展挑战与中泰合作破解路径

施金香（云南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与泰国“4.0”战略、东部经济走廊建设相互对接的背景下，职业教育可以为社会输送大量技术技能人才，也成为推动中泰两国产业合作、政策沟通与民众交流的重要支撑。本文运用制度分析和比较教育研究的相关方法，从专业设置、产教融合、师资队伍、实训条件、社会认同五个方面，分析泰国职业教育在数字化转型和产业升级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研究发现，泰国职业教育存在发展模式固定、校企合作机制不够完善、“双师型”教师数量不足、区域资源分配不均匀、社会认可度不高等问题；目前中泰职业教育合作已经出现鲁班工坊、“中文+职业技能”、校企联合育人等多种形式，但这些合作还存在目标不一致、标准对接不顺畅、资源整合不到位、本土化适应能力较弱、长效机制尚未建立等短板，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泰国职业教育发展遇到的障碍。基于此，本文以问题为导向，运用系统治理的相关思路，提出“专业共建、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标准共认、机制共筑、文化共融”的六位一体中泰职教合作路径，推动跨境职教合作从短期项目带动向系统化制度建设转变，从单向资源输出向双方互相促进升级，为泰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中泰教育合作长期推进以及“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一带一路；泰国职业教育；发展困境；中泰职教合作；协同育人

一、引言

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1]。全球产业链正不断调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在不断加快，“一带一路”建设已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阶段，进入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与教育融合共同发展的高质量阶段。泰国位于东盟核心位置，是“一带一路”上的重要国家。泰国“4.0”战略、东部经济走廊建设和中老铁路、中泰铁路、跨境电商、先进制造等项目联系十分紧密，这也让中泰两国在经贸往来、产能合作、数字经济与现代服务等方面形成互补、协同发展的关系^[2-3]。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既懂专业技术，又有跨文化沟通能力，还会使用中文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会直接影响两国合作的深度和可持续性^[4-6]。职业教育是支撑产业升级与区域发展的重要类型^[2]，其

主要对接产业发展、帮助学生就业、支撑实体经济发展，在落实国家战略、培养高素质人才、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泰国职业教育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已经形成由教育部职业教育委员会办公室（OVEC）统一管理的体系，这一体系包含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非正规培训与社区教育等多个层次，覆盖范围较为广泛^[7-8]。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下，泰国陆续引进现代学徒制、校企合作模式、数字化评价工具等内容，职业教育也朝着规模化、规范化、国际化的方向不断发展^[2,9]。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普及，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泰国职业教育内部的问题逐渐显现，专业设置更新速度慢、课程内容和生产实际脱节、校企合作只停留在表面、“双师型”师资数量不够、区域教育资源差距大、社会上存在“重普教、轻职教”的固有观念，

这些问题共同阻碍泰国职业教育质量的提升^[3,9-10]。

在这一发展背景下，中泰两国在职业教育方面的合作，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空间。“一带一路”倡议推行后，鲁班工坊这类中国职教国际化项目开始在泰国落地^[11-12]，“中文+职业技能”相关项目也逐步得到推广^[4,6,13]，校校往来、教师培训、共同育人、校企合作等多种合作方式不断增多^[14-15]，这为泰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带来了外部的参考经验和动力。但从实际推进情况来看，中泰职教合作依然存在不少阻碍，两国的教育标准和资格框架没能充分对接，人才培养方向存在差异，企业参与的热情不高，跨境配合的机制不够完善，本土化融合的程度也比较浅，相关项目难以保持长久稳定运行^[10,16]。整体来看，目前的合作大多停留在短期活动层面，没有形成系统、固定、长期的安排，也不能从根源上解决泰国职业教育内部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基于以上现实情况，本文按照“发展困境—合作短板—破解路径”的思路展开研究，在梳理泰国职业教育发展体系的基础上，分析制约其发展的关键因素，总结中泰职教合作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不足，最终提出精准对接、协同高效、可以落地、能够持续的中泰合作解决方案。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从制度角度分析东南亚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的共同问题，丰富“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相关理论；实践价值在于为中泰职教合作提升质量提供可行路径，为中国职业教育标准走向国门并与当地融合提供参考，也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跨境教育合作提供可借鉴的模式^[8]。

二、泰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体系与制度环境

泰国职业教育由教育部职业教育委员会办公室（OVEC）统一规划和管理，整体形成以正规职业教育为主体、非正规与社区教育为补充的双轨并行体系^[7-8]。截至目前，OVEC 主管的职业院校已经超过 400 所，专业覆盖工业技术、农业、旅游服务、信息技术、商贸、建筑、健康护理等

十几个大类，专业方向达到 350 个以上，初步形成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专业布局。在学制体系方面，泰国建立中等职业、高等职业、职业本科相互衔接的培养通道，推行学习成果认定与学分转换制度，这也为学生纵向升学和横向流动提供了制度支持^[2,9]。

从政策变化的过程来看，泰国职业教育的发展阶段划分得比较清楚；1999 年出台的《国家教育法》确定了职业教育的合法地位，还把职业教育放进国家整体发展规划中；2008 年的《职业教育法案》突出以学生为核心、跟着行业需求来办学的思路；2016 年以后，在“泰国 4.0”战略的推动下，职业教育被赋予支持创新发展、高端生产和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政策方向也转到新专业设置、数字化转型和对外交流合作上^[3]；2024 年 VNET 国家职业教育测评系统开始全面使用，这也代表泰国职业教育走进数字化评估、精细化管理的新阶段。在办学方式上，泰国参考了德国双元制的做法，推行学校上课和企业实操结合的人才培养方式，鼓励企业通过捐赠器材、提供实习机会、参与课程设计等形式加入办学工作；丰田、奔驰等大型外企在泰国搭建合作实训场地，这些场地也成了支持实践教学的重要支撑；与此同时，泰国看重职业院校服务地方的作用，支持学校针对农村地区、小微企业和基层社区开展技能培训，逐渐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教育、社区、产业互相配合的模式^[7,9]。整体来看，泰国职业教育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制度框架、组织系统和办学条件，可以满足大批量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但在追求更高质量发展要求下，其在体系适配性、制度运行效果、资源分配情况和行业对接能力等方面还存在不足，结构问题也愈发明显^[10]。

三、泰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

（一）专业结构更新滞后，与新兴产业需求错位明显

泰国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一直沿用过去的发

展思路，专业多集中在低端制造、普通服务和传统农业等领域，针对智能制造、数字技术、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跨境电商、现代物流等新兴行业开设的专业数量少、规模不大，教学师资也较为薄弱^[2-3]。泰国在政策上虽然强调要贴合“泰国 4.0”和东部经济走廊的发展需要，可受办学习惯、资源条件有限以及课程改革推进较慢等因素影响，大多数学校还是把传统专业当作主要部分，新兴专业占比不高，实训条件跟不上，教学内容更新也较为迟缓。

从人才供给和需求的搭配情况来看，泰国东部经济走廊每年对智能制造、自动化、信息技术、现代物流等领域技能型人才的新增需求都在十万人以上，当地职业院校对应专业每年毕业的学生人数还不足需求总数的三分之一，专业对口就业比例长期低于三成；专业设置和行业需要脱节，直接导致企业招不到合适员工、学生找不到合适岗位的情况同时出现，人才供给和产业需求无法有效连接，这不仅限制本地产业升级的速度，也会给中泰之间重大合作项目的推进带来不利影响^[3,10]。

（二）产教融合层次较浅，校企协同缺乏制度保障

泰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整体处于学校主动、企业被动的浅层状态。企业参与形式大多为设备捐助、提供实习岗位、开展短期讲座等，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体系开发、实训基地共建、师资互聘共用、技术创新合作等关键环节的参与程度非常低。深层原因在于，企业参与办学的激励政策落实不到位，税收优惠、财政补助、风险分担等机制不健全；校企双方权责划分不清晰，缺少稳定契约与长效合作平台；行业组织参与不足，专业标准与岗位需求脱节；企业考虑成本和风险问题，参与办学的意愿并不强。

在这样的条件下，职业院校很难获取真实的生产场景、先进技术流程与行业规范资源，教学内容跟不上行业发展，实践训练仅停留在模拟练

习层面，学生难以形成符合现代企业要求的综合工作能力；产教融合大多停留在表面形式，无法发挥实际作用，这也成为限制泰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制度问题。

（三）“双师型”师资储备不足，教师发展体系不完善

泰国职业院校教师准入主要以学历与教师资格证书为依据，对行业工作经历的要求较低。专任教师中具备企业实践经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新技术教学能力的“双师型”教师比例偏低，部分院校甚至不足 20%^[3,9]。大量教师长期脱离产业一线，知识结构老化，对工业机器人、数控技术、跨境电商运营等前沿领域的实操能力不足，无法承担高质量实训教学的工作任务。

同时，泰国职教教师培训多以理论学习、常规教学方法训练为主，面向新技术、新流程、数字化教学的专项培训数量不足；教师企业实践制度不够完善，出国交流学习的机会分配也不均衡。此外，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专业能力偏弱、职业发展路径有限等问题相互叠加，导致泰国职业教育缺乏教学创新动力，教育质量提升也缺少关键人才支撑^[17-18]。

（四）实训资源配置不均，区域与校际差距显著

泰国优质实训资源大多集中在曼谷与中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院校，地方院校、外府及边境地区院校，普遍存在实训场地不足、设备陈旧、数字化水平偏低等问题。多数偏远地区院校缺少工业机器人、智能传感、虚拟仿真、云端实训等现代教学条件，实践教学仍停留在传统工具与基础技能训练阶段，难以达到行业与岗位的实际要求^[3]。此外，泰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资源建设速度较慢，优质线上课程、虚拟仿真实训平台覆盖率不高，区域与校际资源共享机制尚未建立，这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五）社会认同度偏低，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

受历史文化与教育观念的影响，泰国社会存

在“重普通教育、轻职业教育”的明显现象，职业教育被看作升学失利后的次要选择，社会地位与公众认可度都比较低^[9]。部分媒体对职业院校负面事件的过度报道，进一步降低了社会对职业教育的信任度。同时，职教毕业生在就业质量、薪资水平、职业发展空间等方面和普通高校学生存在差距，导致家庭选择职业教育的意愿持续偏低。

社会认同不足直接导致生源质量不稳定、优质生源流失、政府与社会资源投入偏向不足等问题，使泰国职业教育陷入“低认同—低投入—低质量—低就业—低认同”的恶性循环，这也成为制约其长期稳定发展的社会文化瓶颈。

四、中泰职业教育合作的实践形态与现存短板

（一）主要合作形式与建设成效

中泰职业教育合作已成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两国产业协同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已经形成了多层次、多领域、多元化的发展格局，主要包括四种典型模式。

一是鲁班工坊建设。鲁班工坊是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标志性项目，在泰国落地后，系统输出专业标准、实训装备、课程体系、教学模式与“1+X”证书制度，重点建设轨道交通、机电一体化、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等前沿专业，搭建集教学、培训、考核认证、就业服务于一体的实体化平台，大幅提升合作院校的实训条件与人才培养质量^[11-12]。

二是推进“中文+职业技能”融合培养，以满足中泰产能合作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合作院校将汉语学习与专业技能教学相结合，开发旅游、商贸、轨道交通、智能制造等领域课程模块，帮助学生完成语言、技术、文化三重适应，显著提升学生跨境就业的竞争力^[4-6]。

三是开展校企协同与订单式培养。在泰中资企业与当地职业院校共建产业学院、定向培养班、实训中心，企业深度参与课程开发、教学实施、

实习实训与就业推荐，实现“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企、毕业即就业”，有效缓解企业技能人才短缺问题，形成产教协同育人的常见模式。

四是加强师资交流与能力提升。中方院校通过短期进修、跟岗学习、联合教研、线上培训等形式，为泰国职教师资提供新技术、新教法与国际化教学支持，帮助泰国教师更新教学理念、提升专业能力，为泰国职业教育自主发展提供人才保障^[17-18]。整体来看，中泰职教合作有效补齐泰国职业教育在实训条件、课程资源、新兴专业建设、国际化水平等方面的短板，为两国产业合作提供稳定人才支撑，成为促进中泰民心相通的重要纽带。

（二）合作存在的短板与深层制约

一是培养目标存在偏差，供需对接不够充分。院校更看重学历提升、课程完成和证书获取，企业则更关注职业素养、实操能力、责任意识与团队协作，双方在培养定位、评价标准、质量导向上存在差异，最终培养出的人才能用但不好用。

二是教育标准存在壁垒，资格互认机制不健全。中泰两国职业教育专业目录、课程标准、实训规范、资格框架存在差异，学历、学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机制不完善，学生升学、跨境就业与终身学习都面临制度障碍。

三是资源整合度不高，协同运行机制缺失。合作大多依靠校际自发对接与项目驱动，政府、行业、企业、院校四方联动不足，缺少统筹平台、整体规划与持续投入机制，项目可持续性弱、覆盖面有限、示范带动效果不足^[16]。

四是本土化融合程度不足，项目落地效果受限。部分合作项目直接照搬中国的办学经验和模式，未充分结合泰国的教育制度、文化习惯以及产业发展实际，导致合作模式流于表面，无法有效满足当地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

五是复合型师资力量短缺，保障能力不足。既懂中文又具备专业技术的教师数量较少，教师

的企业实践经历不足，专业能力和教学水平难以适配现代产业发展需求，难以支撑职业教育质量的提升^[17]。

五、中泰合作破解泰国职教困境的协同路径

结合泰国职业教育实际问题与中泰合作基础，本文以精准破题、系统治理、长效协同为原则，构建六位一体破解路径，以期推动合作从项目驱动走向制度构建，从资源输入走向双向赋能。

（一）专业共建：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优化人才供给结构

围绕“泰国 4.0”和东部经济走廊的重点产业，共同打造智能制造、数字技术、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现代农业、跨境电商、现代物流等前沿专业群。中泰双方共同开展行业调研、岗位能力分析和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使课程内容、实训项目、考核标准更适配行业岗位需求。鼓励在泰中资企业更多参与专业建设，将真实的工作流程、技术要求、质量规范融入教学各个环节，使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保持一致、同步推进^[2]。

（二）师资共育：构建“双师型+复合型”师资发展体系

建立中泰教师互派、跟岗学习、企业实践、共同教研的长期机制，扩大泰国教师来华学习的人数，重点提高教师在数字化教学、跨文化教学方面的能力。共同开发“中文+专业”的教师培训课程，打造一批同时具备语言能力、专业技能和教学水平的复合型教学队伍^[17-18]。完善教师互聘、兼职教师引进相关政策，吸引企业技术骨干参与教学工作，提高实践教学的占比和整体质量。

（三）资源共享：推进实训基地与数字化平台协同建设

以鲁班工坊为核心平台，扩大优质实训资源覆盖面，向地方及外府院校辐射设备、课程、标准与认证服务。共建中泰职业教育数字化云平台，整合在线精品课程、虚拟仿真实训、技能测评系统、就业信息库等资源，突破时空限制，缩小区

域差距^[11-12]。推动实训基地开放共享、校企共建共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实践教学现代化水平。

（四）标准共认：推动学历、学分与职业资格互通对接

建立中泰职业教育资格框架对接工作组，推动专业标准、课程标准、实训标准与质量标准互认兼容。完善学历互认、学分转换、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机制，推动“1+X”证书与泰国国家资格框架（PQF）对接，为学生升学、跨境就业、终身学习提供制度保障。探索联合认证、联合评价、联合发证模式，提升人才培养的国际认可度^[16]。

（五）机制共筑：构建四方协同的跨境职教治理体系

搭建政府引导、院校主体、行业指导、企业深度参与的中泰职教合作联盟，建立常态化对话、项目统筹、资源整合、质量监控与风险防控机制。完善政策支持、经费保障、激励约束与绩效考核制度，推动合作从短期项目转向长期战略，从分散运行转向系统治理，形成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合作生态。

（六）文化共融：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同与吸引力

联合开展职业教育宣传、技能比赛、社区服务、优秀毕业生故事分享等活动，树立职业教育的正面形象，改变社会上的片面看法。依托“中文+职业技能”项目，提高就业质量与收入竞争力，进一步增强职业教育的实际吸引力^[6,13]。加强跨文化教育与人文学往来，增进师生之间的理解与信任，让职业教育合作成为深化中泰友好关系的重要桥梁。

六、结论

在“一带一路”高质量推进与泰国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泰国职业教育面临着专业结构不合理、产教融合程度不深、“双师型”教师数量不足、实训资源分配不均、社会认可度不高等一系

列问题。中泰职业教育合作具备扎实的政策基础、产业需要和实践经验,是破解泰国职教发展困境、推动两国教育与经济共同发展的重要途径。

当前,中泰职教合作还面临目标错位、标准壁垒、资源分散、本土化融合不足、复合型师资紧缺等现实制约,急需从碎片化项目合作转向系统化制度构建。本文提出的“专业共建、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标准共认、机制共筑、文化共融”六位一体破解路径,以问题为导向、以制度为核心、以长效为目标,能够精准回应泰国职业教育的结构性矛盾,推动跨境职教合作提升质量、走深走实。

未来,中泰双方需持续深化合作,在政策层面强化协同联动,整合双方优质教育资源,不断创新合作模式、深化跨文化融合,推动两国职业教育合作向更高质量、更高效能、更可持续、更具开放性的方向稳步迈进。

参考文献

- [1]刘韵超,韩颖,章一超.“一带一路”倡议指引下农业经济国际合作专业人才培养的实践要求[J].农业经济,2025(5):140-142.
- [2]张蓓.“泰国4.0”战略背景下泰国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及改革策略研究[J].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22(5):85-90.
- [3]何芯.“一带一路”背景下泰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J].国际公关,2025(17):161-163.
- [4]杜修平,李梦迪,尹晓静.“中文+职业教育”融合参考框架的构建[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9):49-55.
- [5]梁宇,李诺恩.供需视角下的“中文+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构建[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65(1):107-113+155-156.
- [6]孟源,商若凡.“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发展脉络、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29):28-33.
- [7]宋晶.泰国职业教育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17(3):78-82.
- [8]李建求,卿中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技术教育概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 [9]刘利利,李琛.泰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问题、对策及对我国的启示[J].西部学刊,2019(9):15-19.
- [10]任彦慈.“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泰职业教育合作办学的实践困境与优化策略研究[D].广州:广东技术师范大学,2024.
- [11]岳金凤.共建“一带一路”,鲁班工坊大作为——“‘一带一路’合作与鲁班工坊建设发展论坛”综述[J].职业技术教育,2022,43(24):32-34.
- [12]吕景泉.鲁班工坊核心要义: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品牌[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
- [13]洪桂治.泰国“中文+职业”教育发展现状与前瞻[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50-59+114.
- [14]王冬云,胡志仁,孙廖源.中泰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模式探索与研究——以柳州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22(3):83-87.
- [15]纪述.职业能力导向的高职中泰联合办学模式探索[J].辽宁高职学报,2020,22(4):4-7+23.
- [16]张小军,刘慧敏.“一带一路”倡议下高职院校国际交流合作面临的困境与出路[J].教育与职业,2020(5):51-55.
- [17]周燕,段媛媛,王瀛.面向“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J].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23(4):26-33.
- [18]梁宇,刘根芹.“中文+职业技能”教学资源建设的现状与展望[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8(1):24-31.